

“承宪康先生，人真好！”

○吴学昭

宪康同志走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不仅是失去亲人般的悲痛，似乎与清华、与清华校友会之间最有力的联系突然断了。当杨绛（学名季康）先生听到宪康同志病逝时，百岁老人“唉……”一声长长的叹息，眼圈红红。陈寅恪先生的女儿流求、美延听说这个不幸的消息，也是连叹惋惜，“承宪康先生，人真好！”

对于我们这些年届耄耋的校友和老教工家属来说，承宪康，就是清华、就是校友会的代表！大家几乎已经习惯了“有事，找宪康！”而宪康同志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诚信真挚、有求必应。他的manners——言谈举止、礼貌风度、待人接物……体现出他的文明教养、他的人格魅力，与他多少年来默默不懈地助人为乐密不可分。许多往事，令人难忘。

南翔生病住院，宪康同志送来刘天华精彩的二胡独奏磁带，希望音乐能稍稍帮助缓解病痛。南翔说：“难为承宪康还记得我喜欢刘天华演奏的二胡。”宪康在学校就读时，一次师生同乐会上，南翔曾为同学们表演二胡，拉的正是刘天华作的曲目！宪康还曾陪伴清华培养的第一位工科女博士倪以信、清华文艺骨干吴亭莉等来看望老校长。谈起当年倪以信在上海考区成绩优异，而有关方面以她有宋美龄这样的亲戚，清华似不宜录取。

南翔为之力争，谓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固然要弄清，但更应注重个人表现；宋美龄是亲戚，宋庆龄不也是亲戚吗？！王大中、陈清泰等同志，也是在宪康陪同下来问病的。清华友生的欢声笑语、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常使南翔在同疾病和疼痛的紧张斗争中得到片刻舒缓，感觉欣慰。寂静的病室，变得活跃。

南翔去世后，逢年过节宪康总会来电、来信问候，还和我一同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过南翔。上世纪90年代初，听说我正在整理父亲吴宓的日记，1910至1948年的前十卷，涉及清华的内容甚多；宪康同志抱来一大摞《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供查对参考。又介绍我认识校史室的孙敦恒、田彩凤老师，待做人名注释时咨询请教。宪康同志为弄清清华学堂开学的准确日期，也曾来我家认真查阅父亲1911年



2001年“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设立仪式前。
左起：吴学昭、李传信、杨绛、白永毅、承宪康

□ 师友情

3月30日（阴历三月初一）的日记，并复印。日记明示是日星期四，“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三跪九叩）及谒见职员礼（三揖）而退。旋由总办周（自齐）、教员某某、监督范（源濂）先后演说，言此校亦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律皆系官费云云。”

南翔的同乡知友张宗植，1933至1935年在清华就读，是一名活跃的共青团员。曾助《清华周刊》主编牛佩宗集稿和编辑出版，并发表过许多散文和短评。他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培养发展进步社团成员，引起当局注意。1935年与当时主持清华地下党工作的何凤元、徐高阮等八人被国民党北平党部逮捕。以“案情严重”，与徐高阮被解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半年后，经亲戚以不再回北平去为条件保释出狱，从此失去了与共青团和北平学生运动的联系。张宗植后去日本留学，抗日战争期间回国服务航业，抗战胜利被派驻欧美，最后移驻东京，居留日本。

张宗植身居海外，心向祖国，尤其怀念年轻时候的同学和战友；所以1980年6月得知南翔率团访日，连忙赶到中国驻日使馆招待所，会晤四十多年未见的老友，畅叙别情。从此经常回国，每访问清华，都由宪康同志接待。他对宪康的热情周到、一丝不苟，印象深刻，感激莫名。正是由于宪康的穿针引线，张先生见到了几乎所有他极为系念的“一二·九”战友韦君宜、王作民、旷璧城、高承志、吴承明等，并一同缅怀已故战友。

张先生与诸多老朋友叙谈后非常感慨，对南翔说：“一二·九”当年的青年学生团队好比是促进中国革命的一支洪流，他自己原也是这股洪流中的一滴水，只是在奔流中遇到石块激突，被抛掷到岸边的石缝中，从此卷入另一境地。但水终是水，愿中国繁荣富强的希望与正流一样；为弥补自己未能与大家一起做贡献的缺憾，他想在清华设立一项以当年清华团队的带头人蒋南翔为名的奖学金，表示心意。南翔支持他设奖学金嘉惠学子，但坚决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最后商定命名为“一二·九”纪念奖学金。南翔建议奖励对象包括教师。

宪康为“一二·九”奖学金的建立忙前忙后，除了与张先生保持联系，还经常与张先生委托经管此项事务的张滢华女士交换意见。张女士也是清华老校友家属，她先生何凤元乃张宗植的表哥，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清华外文系，是当时清华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宪康同志很尊重也很关心张女士，常常嘘寒问暖。通过多年交往合作，彼此已很熟悉。张女士后来生病，记忆力严重衰退，许多人与事都已说不上来，但始终记得“承宪康”这个亲切的名字！

杨绛先生常对我说，承宪康是“最可信赖的同志”，她托付于宪康的事，没有一件没有结果；哪怕是看来不会有结果或很难有结果的事。老人家维权，大连图书馆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两名所谓超级“钱迷”，因严重侵犯钱锺书著作权而受到国家版权局处罚后恼羞成怒，对杨先生百般攻击，甚至造谣杨先生根本不在清华读研究生。当他们正在媒体上大事炒作

杨先生“吹牛”的时候，宪康不声不响，很快寄来当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杨季康的学籍卡片，并将此卡片影印发表，作文澄清谣言。杨先生至深感激宪康的“仗义”，称赞他动作之快、效率之高，出人意外。我能体会，宪康为此所花费的时间，投入多少心力。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李俊清，从我父亲授业，1943年秋响应号召投笔从军，随美军赴印度。抗战胜利后曾到清华来领取他的毕业证书，告称已被其同学代为取走。李俊清后在台湾任蒋经国英文秘书二十年，起初因无铨叙部考察必需的大学文凭相当为难，最后幸由曾任西南联大训导长的查良钊先生作书证明方获解决。蒋先生去世后，李俊清任教东吴大学，研究庞德和艾略特甚有心得。改革开放后，也是由宪康之助，找到李俊清附有照片的西南联大学生履历表。李先生收见此表的复印件，如获至宝，定要我代为寄奉一册他所笺注的*Humananistic Wind from the East: A Brief Discussion of Ezra Pound' Cantos and Translation* (东风西渐：艾兹拉·庞德与华夏诗篇)给宪康，作为纪念。后来李俊清访问清华，又将他珍藏多年的庞德和艾略特著作及有关研究书籍捐赠母校图书馆。

宪康同志善解人意，许多老校友、老教工家属的冷暖困窘都挂记在心，想方设法，帮助排忧解难。陈寅恪先生夫妇“文革”中受尽迫害，于1969年秋冬相继去世。遗体火化后，骨灰起先留置火葬场，以后落实政策，陈先生骨灰被移放广州革命公墓。幼女美延就将父亲的一半骨灰和母亲的骨灰，一同捧回她在中山大学的宿舍，朝夕相伴。一心想着如何遵照父

亲的嘱咐，归葬他们的遗骨于杭州六和塔后的牌坊山祖茔，“伴随父母与兄长身旁”。为实现父亲这个心愿，流求姐妹改革开放后奔走呼吁近二十年，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求助协商，最终没有结果。宪康同志向回国访问的顾毓琇先生反映了这一情况，请他应中共中央总书记邀请去中南海做客时，当面向总书记寻求支持。尽管顾老后来告知，总书记听后“默然未语”……宪康同志和顾老先生的心意，仍使流求姐妹和我们感动。

顾毓琇先生文理兼长，1923年从清华毕业留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1950年定居美国。顾先生对清华很有感情，改革开放后，每次回国都要到清华小住，多由宪康同志接待；于宪康的谦和温厚、聪敏细致、办事周到，印象深刻，赞美有加。1998年我赴美探亲，曾去费城看望顾老夫妇。临别时，老先生说，改革开放后，他们夫妇已回国访问18次。他今年96岁，婉靖也已92岁，以后可能回不去了；要我代向朋友们问好，特别提到宪康同志。王婉靖女士还带着浓重的乡音嘱咐道“承先生迭个宁（这人）真正好，一定替我侬芒芒伊（问他好）！”

1934年化学系毕业的校友马祖圣，后为国际著名化学家，长期执教美国。自1981年以来，为汇款补助母校化学系、化工系购置书籍、仪器、设立助学金等事，一直与宪康同志保持联系。2007年马先生辞世，夫人朱觉方女士给宪康同志发来的传真中说：“多年来他与你的交情，是他晚年的一件乐事。”

□ 师友情

朱女士寄来马老的化学著作、研究文件和一些遗物，分赠清华有关单位。其中有一张马老上世纪30年代初摄于清华图书馆地下书库的杨绛自读照：年轻的杨季康秀美可爱，全神贯注地坐在小桌前用功，毫未察觉有人已将此景收入镜头。杨先生收到宪康翻拍的这张老照片，欢喜地说：

“我当时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有人为我拍照？”

宪康同志总是这样时常为人带来意外的惊喜。2011年初夏，病中强忍着疼痛写了《仁者寿》的文章，为杨绛先生百岁诞辰祝寿。杨先生很受感动，再三请清华教育基金会的同志代她向宪康深致谢意。宪

康生病，她一直很挂念，常向教育基金会池净等同志打听宪康病情，感谢她们对宪康的关心照顾。

牵挂宪康的人其实很多，他不让大家前往探视，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宪康同志走了，带走了我们不尽的思念；但他没有走远，离去的是他的躯体，活着的是他的灵魂。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我的眼前，他热心助人的种种往事，已凝聚成回忆的彩带，抬头就能望见。宪康同志依然与我们同在，他的品格和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向前。

癸巳年清明节后一周

谢寿椿：一个终生践行校训的人

○周新嵩（1964工物）

2013年8月15日晚，突然接到了甘小杰学长电话：“谢寿椿已于14日在兰州去世了！”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寿椿学长是50年代初清华摩托车的首任队长，也是北京首位摩托运动冠军。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队友、一位随时都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的好朋友。

他也是我们摩托车优良队风的缔造者，是一位终生践行“自强不息”清华校训的优秀典范。半个世纪以来，他“厚德载物”的件件往事已凝聚成我们永恒的回憶。

我与寿椿学长同年出生，因他长我数月，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学弟。我们在校并无交集，1958年秋我入学时，寿椿学长政治上遭受不公待遇，已背负着沉重的

包袱远赴西北荒原，步入了接受“改造”的苦难而坎坷的一生。

初识寿椿学长于1960年秋。在西北“改造”了两年的他由于工作出色而摘去了“右派”帽子，回校补领到应该是两年前就发给他的毕业证书。其时，我们在运动场上相遇、相识。此后，他每年回京探亲时，都会到西体育馆操场周边探访在场上锻炼的摩托车队何浩、张允恭、李孝美、甘小杰等老队友。因此，我也与之不断加深认识并有所交往。1964年夏我毕业离校，此后音讯相隔。

再次与寿椿兄相逢时，已跨过十年动乱时期。“十年动乱，关牛棚，扫马路，烧锅炉，修战备地道……样样都干，一日工资才五角钱，也能糊口。”“健康的